

第二波

王海明 编著

转轨中国的二次革命

历史的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思想的充分启蒙
『第二波』——这一次以经济为基点，也以经济为起点的启蒙
如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经济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思潮在二十世纪二次涌起，掀起思想启蒙的问题，整个讨论其意识形态的争论，反思改革很容易滑向反改革……
是否可以认为，这场大辩论形成的改革共识将为下一步改革提供方向与动力？也许就是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深刻论断。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第二波

转轨中国的二次革命

王海明 编著

历史的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思想的充分启蒙。继上世纪80年代视野开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思潮在21世纪二次涌起，掀起思想启蒙的“第二波”，这一次以经济为基点，也以经济为起点。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讨论的焦点在于姓社姓资、是否进行改革、是否推进市场经济制度，那么，现在则围绕怎样选择改革方向和走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整个讨论关系思维形态的变迁，反思改革很容易滑向反改革……

可以预见，这场大辩论形成的改革共识将为下一步改革提供方向与动力，也将成就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转折。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波 / 王海明编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4

ISBN 7-5086-0614-0

I. 第… II. 王… III. 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8899号

第二波

DI'ERBO

编 著: 王海明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89千字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614-0/F · 1010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又被用来解释、预测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一般决定于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而重要的经济现象往往都发生在重要的经济中心。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亦步亦趋，总是与世界经济中心形影相随。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到上世纪30年代的将近150年时间里，世界上的经济学大师主要集中在英国。但是从上世纪30年代或者是说从凯恩斯之后一直到现在，随着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也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世界上的经济学大师，绝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内外许多学术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或更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并在2030年左右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具影响的经济。这就意味着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必将精彩纷呈，必将涌现出最为丰富和最为鲜活的经济现象，由此而成为全世界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焦点和中心。

任何一个理论的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理论所假设的条件与其所解释现象背后之原因的真实条件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的理论，也可能不适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发达的英国、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也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为对象而提出理论。这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相比，在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条件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理论，必须根据中国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模型，用这些理论模型对中国的现实来进行新的解释。

虽然美欧等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转型中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但是由于他们不生活在其中，对这些



林毅夫 序

国家的种种限制条件缺乏深层次的了解和切身体验，对许多制度安排和现象的内生性如瞎子摸象般地把握不住、拿捏不准，所提出的理论也大多不免如隔靴搔痒，有的甚至南辕北辙。

中国经济正在成为最前沿的研究目标和理论源泉。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依靠中国的经济学家以对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为基础，创造出新的理论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深入了解各种发生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不断地就各种新的观点、思路和方法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探讨，通过思想的碰撞和交锋打磨才有可能提出成熟的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讲，这既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欣喜地注意到了在迎接这个挑战的众多个人和团队的行列中，王海明策划和主持的“21世纪北京圆桌”已经脚踏实地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作。它为研究中国经济的各路专家，提供了一个阐发真知灼见和争议讨论的平台；它不回避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尚且存在和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它能客观地表述现代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妥协、制约与调和；它收集并及时发出了诸如在收入分配差距、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环境资源、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职能定位等许多现实热点问题上的各种声音。在我看来，它无疑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好的经济论坛之一。

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希望“21世纪北京圆桌”能融会更加广泛的层面，聚集更加丰富的观点，从而引发出更多的宏论高见，并展示出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当然也愿意继续与之密切合作，共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以及学术的繁荣作贡献。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2006年春节

中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三大经验：改革、开放与稳定。

对于改革，每一位经历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深有体会。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要转变为市场经济，必须要进行相当彻底的改革。这样的经济转变，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使用，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

有人会说，不是有那么多的成熟经济理论可供参考吗，为何不用？

我们现在都知道，每一种理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针对某一种现象提出来的，要说它的普适性，只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但是达到市场经济的路径和条件却是在试错过程中逐渐寻找到或创造出来的。这就是中国的路径，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比如说，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实行承包制而没有简单地将土地分给农民；比如说中国的金融改革，从一家银行体制逐渐发展成有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用了20多年，没有像有的国家那样，将大银行全部拆分成众多私有中小银行；比如说企业改革，经过若干年的试验，才逐渐被认可了股份公司制的企业形式。这中间有历史的原因，有思想转变的过程，也有对规律的不成功的探索，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因此，一个局外人看中国经济，觉得看不太懂，因为他们现有的知识和市场运行规律有很大不同。用他们既有的理论与管理经验无法对中国经济作出正确的估计。

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伴随改革一起产生的，20多年中，几乎每一次大的开放政策，都有大的讨论。我们不说太远的事，就说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酝酿改革时，国内外的观点针锋相对，市场反应激烈，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汇改必然会使人民币汇率极大地贬值。当时的官方汇率大约是1美元兑5.7元人民币，加上调剂价大约1美元兑7元多人民

币。但黑市上，临近改革时，1美元可以兑换大约11元人民币！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贬到8.7元人民币并取消外汇调剂，之后的几年，人民币却一直是升值而不是贬值。

中国加入WTO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当时，相当多的讨论认为中国加入WTO将会面临极大的市场损失，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受到致命打击。但是，加入WTO以来的发展使我们看到市场开放后，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大的损失，而且上了很大一个台阶。当然，在开放之前，我们应该把问题想得严重一些，问题说得多一些，结果会好一些，防患于未然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要把问题过分渲染到使开放受损。

现在，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引入国外战略投资人，也引起极大的争论，甚至有人认为这会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其实，一个无效率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对金融安全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所带来的威胁。开放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逐渐减少了国内与国际间的差异。

关于稳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除了坚持以上的路径外，我们可能应更多地关注创新能力。市场永远欢迎有创新能力的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能够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那么创新来自于哪里，它来自于鼓励自由表达和讨论的社会环境。王海明主持的“21世纪北京圆桌”提供了一个思想交锋的平台，政策制定者、学者以及商界精英可以面对面地就中国面临的国内与国际挑战与机遇，提供睿智的解决之道。

中国对经济学的理解，是循着“经邦济世”之学的路在走，因此，中国的经济学之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公众人物”是有其人文渊源的。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唐 旭

2006年春节



目录

林毅夫 序
唐 旭 序

第一章

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向左？ 1

构建和谐社会 2

坚持效率优先 更加注重公平 15

转变政府职能 解困医疗社保 25

第二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从“以农补工”到“以工哺农” 35**

新一轮“一号文件”开启“反哺时代” 37

建设新农村之历史困境与机遇 49

第三章

工业路径与瓶颈： 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 61

“重化工业化”道路与南北经济转型之辩 62

能源瓶颈与出路 90

海外并购：中国企业“跃龙门” 98

第四章

2005：通缩、通胀 “冰火两重天” 113

调控地产 114

加息还是升值？——第一季度数据分析 128

中国经济冷热之争——宏观经济年中辩论 138

“通缩”与“通胀”之辩——第三季度数据分析 161

2006：通缩共识？——2005年数据分析 172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突出重围 183

激辩“汇率报复案” 184

人民币汇率改革路线图 194

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忧思 207

第六章

高度贸易依存危机？ 221

后配额时代：纺织品贸易艰难自由化 223

顺差“井喷”与高贸易依存度之辩 238

大国贸易与经济转型 252

第七章

银行改革：

股改、上市与金融安全 263

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边博弈边嬗变 264

考量银行改革 272

第八章

股改转折年：伟大的博弈再启程 283

资本博弈与大国崛起 285

基金现象 299

第九章

财税体制转型：

历史的又一个节点 313

财税体制转型 314

第十章

美国的新对手：中国和印度 329

大国崛起的机遇与挑战 330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344

中印：龙象之争还是龙象之盟 354

跋

改革开放“第二波” 363

策案二波

第一章

构建和谐社 会：中国 向左？

- | | |
|-----|-------------------------|
| 韩启德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主席 |
| 林毅夫 |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
| 高西庆 | 社会保障基金会副理事长 |
| 易纲 |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
| 谢平 | 中央汇金控股公司总经理 |
| 郑功成 |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 |
| 刘福垣 |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 |
| 陆学艺 |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
| 丁宁宁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 |
| 王绍光 |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
| 毛寿龙 |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主任 |
| 周为民 |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总编辑、经济学教授 |
| 栗树和 | SAP中国首席代表 |
| 汪丁丁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
| 夏斌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

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转换已经清晰可见。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开始追求平衡的发展路径。而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如何把握和谐与发展的关系，则需要从多个维度理性地考量：中部崛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诸多新政策的提出，

无不以“和谐”为主线；医疗、社保、教育等等方面的激烈辩论，无不表明“和谐”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造成如此之多的不和谐音符，是市场化的罪孽还是市场化不足的结果？是需要继续推进改革还是需要反思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重视公平问题，是否意味着对“效率优先”原则的否定？是否标志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从右向左？这又涉及到中国经济学教育和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指导等。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刘国光认为，西方经济学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所有这些问题和观点，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

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关节点”：经济取得了飞跃性进展，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等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时出现。矛盾的解决方案，需要“和谐”的引领。

2005年2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学习的主题为和谐社会。他强调，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着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

胡锦涛之前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他同时定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正视现实、解决矛盾的决心，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成为2005年全国“两会”的主要议题。

理解和谐社会

《21世纪》：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等“五个统筹”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的具体内涵，诸位如何理解？“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又如何？

陆学艺：胡锦涛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并列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并且成为三者的目标所向。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强调经济建设、强调GDP，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即“五种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并据此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就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来构建和谐社会。

丁宁宁：随着市场体制的深化，上世纪80年代“在蛋糕做大的同时，所有社会成员都或多或少能够分享到”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不仅威胁社会的稳定，而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就成为政策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按照世界银行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估计，近两年来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 000美元。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即经济结构迅速变革，引起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

今后一段时期内，每年都会有很多新兴的工厂和城市出现，同时也会有不少的企业和农户破产。迫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产业结构不断地进行调整，产业工人不时地被抛入失业大军的行列。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

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技术进步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在迫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去面对新的挑战，适应新的角色，加剧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

刘福垣：提出和谐社会确有其历史背景。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基本上是协调的，大多数人是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5年以来，在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分化急剧加速，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即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矛盾、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和诸种社会矛盾交叉激化，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在目前这种失衡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决策者都确定了率先现代化的发展战略，集中精力经营他们的城市，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他们只追求GDP的增长，不重视GDP是如何分配的，对社会分化分裂的后果掉以轻心。为了避免我国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不动声色地调整了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和谐的关键是确保低收入人群没有后顾之忧。这就需要加大整个社会保障的力度。

王绍光：中国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社会？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追求建立“大同社会”。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更务实。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邓小平当然也没有把“小康”当作最终目标，那时的小康指标很单纯，就是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就算达标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到上世纪90年代末，经过2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翻了几番，人均收入增加了几倍，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各种矛盾也暴露出来，有些还变得十分尖锐。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仅仅讲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在20世纪末，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加入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的内容。

新一代领导人现在又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我认为这才是抓住了人生的本质——即幸福感（Happiness），也就是说，人一生追求的不是有多少东

西，而是一种幸福！基辛格博士曾认为人生有两种不幸：一是追求不到自己想追求的，另一种是追求到了，却发现并非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从上述回顾来看，中国在经历长期的发展后，终于认识到不能光追求经济增长，而且要追求幸福。以前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以为单一地追求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掩盖了许多社会矛盾。

毛寿龙：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提法。社会学从两种角度去看待一个社会，一种是冲突的角度，还有一种是合作的角度。政府提出来的和谐社会可能跟学者提出来的有点差别，这里我主要从政府的角度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和谐社会。

上世纪80年代强调发展是硬道理，90年代强调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发展计划提的都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不过在当时，真正落实在政策上，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GDP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对和谐社会的界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跟社会有关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跟政治有关系；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学术上更接近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待社会，从社会意义来看待政治发展。

不过，和谐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政策理念，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从政策上来看，和谐社会关键还是要落实在关注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上。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关注阶级斗争，在改革开放后，关注经济发展。现在改革开放到一定阶段，重新关注阶层问题。因为现在社会日益分化，社会从相对无差别的社会进入了一个阶层社会，在这一进程中还出现了“仇富心态”、“仇官心态”。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政策上认真面对，并采取相应的方案加以解决，至少是缓和其中的尖锐矛盾。

王绍光：胡主席已经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依我的观点，标准其实只有两个：第一，就是矛盾要越少越好；第二，矛盾出现后，应该有一套机制使矛盾合理、顺畅、和平地解决。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从第一个标准来看，“五个统筹”非常重要。

不和谐“症状”

《21世纪》：目前我国社会存在哪些不和谐的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呢？

陆学艺：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从另一个视角看，

就是因为存在着五个不和谐。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新概念。建国几十年以后，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不够和谐。比如我们的经济发展已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城市化还处在初期阶段。实际的城市化率只有30%，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很不协调。而2004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是50%。

刘福垣：关于城市化率，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是27.5%，应该更准确一些。

首先是社会保障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社会保障问题重视不够。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前面的九个字，是有实际内容的，“社会主义”就表现在“全社会”的概念上。在全社会总的剩余价值中，大头要归社会占有，用来搞社会保障。现在有一部分要纳入财政预算的社会保障没有解决。

第二，土地批租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国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对接是租佃制，一方面批租的土地使用权转到开发商，房价高涨，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甚至也租不起。

可以说，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经济、社会、自然诸种矛盾交叉激化，产品、产业、区域、城乡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愈演愈烈。人们的收入差距超常规扩大，基尼系数大于0.4；社会保障不到位，义务教育“不义务”，低收入阶层住宅严重短缺；广大人民群众不敢消费和无钱消费，从而造成银行存款超常规增加，消费品超常规积压，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社会犯罪率不断提高；内需严重不足，片面依赖外销，租、税、费和利润几乎全部送给外国和香港的经销商，靠压低或克扣农民工工资获得企业利润和贸易顺差；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矛盾日益尖锐，区域同构日益严重，只讲对外开放，不讲对内开放；城乡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9倍，扩大到目前的4倍以上，小生产方式凝固化，农业收入已经不能维持农户经济的简单再生产，新增就业岗位不如新生农业人口多。再不转变发展观我国将要重蹈拉美覆辙，陷入“现代化陷阱”不能自拔。人们终于认识到把增长当发展的严重后果，认识到增长方式转变和生产方式转变不是一回事。

丁宁宁：根据国务院发展中心社会部的研究，“十一五”期间特别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防止矛盾的激化，必须把促进就业、提高就业质量作为政府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则应着重“打击官商勾结的非法高收入，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则需要进一步转变思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保障改革问题上，过多地强调减轻财政负担，导致新体制的覆盖面过低。在就业问题难以彻底解决、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目前以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思路，却将最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排除在外。结果一遇风浪，政府还是要承担“两个确保”的责任。因此，“十一五”期间需要转变思路，在“两个确保”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依托、城乡一体化、“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救助制度，以保持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稳定。

陆学艺：我觉得，我国当前最大的不协调是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不协调，经济结构跟阶层结构不协调。2003年在GDP中农业只占14.6%，但农业人口占72.5%，农业劳动力占49%，这么多的人分14.6%的GDP，所以农民穷。区域结构方面，东西部的差别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西部农村跟东部农村比差别实在太大了。十六大提出来“要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别”之后，因为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和采取应有的措施，这几年这些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到目前这种差别有增无减。

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是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是阶层结构，而现在我国的经济结构、阶层结构都存在不合理现象。1995年以后，从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这10年分配机制和分配政策都很不合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富得更快了，但有一部分人不仅收入不增加，反而下降了。强势阶层拿得太多，而有些弱势阶层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现在出了三种人，问题严重。第一是减员增效、分流下岗后的失业工人。第二是失地的农民，失地农民目前约有4 000多万。这4 000多万人大多数原来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大中城市的郊区，失地之后，变成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第三是失房子的居民，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些年遭拆迁的居民，不仅失房了，而且也就失业了，利益受到侵害。这三部分人是目前上访上告的主体。

王绍光：中国社会存在着“攀比心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而且这种心理正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某种程度上看，它对刺激经济发展的确有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发展却是不利的，会造成家庭、社会等许多方面的不和谐。攀比心态导致的一种状态就是社会公民的高度紧张，有一项调查指出，中国人的不安全感正不断上升。